

青少年研究经典译丛

主 编 杨 雄

副主编 程福财



童年论

Theorizing Childhood

[英] 艾莉森·詹姆斯 克里斯·简克斯 艾伦·普劳特 著

Allison James, Chris Jenks, Alan Prout

何 芳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青少年研究经典译丛

主 编 杨 雄

副主编 程福财

童年论

Theorizing Childhood

【英】艾莉森·詹姆斯 克里斯·简克斯 艾伦·普劳特 著

Allison James, Chris Jenks, Alan Prout

何 芳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译丛总序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 20 世纪 80 年代,青年的信仰问题、生存与发展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进而激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一波蔚为壮观的青年研究热潮。今天活跃在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研究和教学一线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开展过青年研究,留下过关于青年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是在那个时候,人们提出了建立“儿童学”、“少年学”、“青年学”的目标和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但是这些热情,这些蓬勃的场景,在 90 年代之后逐渐冷却、退场。今天,还在坚持为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执著努力的学人似乎在减少,国内高校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专门从事青年研究的机构也出现减少的趋势。

另一方面,现实中人们对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的关注、争议,甚至误解并没有减少。成人社会对一代又一代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又充满了担忧。但是,成年人所有关于 70 后、80 后、90 后,乃至 00 后的这些担忧以及因为这些担忧制定和实施的各类社会政策,并没有得到年轻世代的认同。在这个变动着的社会中,年轻人的价值、心理、行为及其社会生活,值得我们理论上予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因此,撇除青年研究学科化发展这个纯学术理想不说,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的实际本身也值得我们投入更有质量的研究努力。所谓更有质量的青年研究,大抵需要有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需要有更有效的研究方法,还需要有更严格的学术规范。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国外青年研究者出版了许多杰出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著作,有的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成为我国青年研究者和对青年发展感兴趣的读者的必读书目。但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已有的关于国外青少年研究著作的翻译引介工作还存在两个不足: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系统地翻译国外青少年研究经典著作的译丛,相关的翻译比较零散化;第二,

目 录

译丛总序 / 1

译者序 / 1

第一编 想象童年

第一章 前社会学中的儿童 / 3

引言 / 3

前社会学中的儿童 / 9

结语 / 18

第二章 社会学中的儿童 / 19

引言 / 19

过渡性理论：社会性发展儿童 / 19

社会学中的儿童 / 22

结语：一条新的道路 / 29

第二编 定位童年

第三章 社会空间中的童年 / 33

学校化的儿童 / 36

城市儿童 / 42

童年和家庭空间 / 48

作为一个受压制的(从属的)空间的童年 / 50

结语 / 52

第四章 童年的时间性 / 54

不同时代的童年 / 55

作为生命历程一个时期的童年 / 58

童年和世代 / 59

儿童的年龄 / 63

儿童的时间建构 / 67

儿童对时间的体验 / 70

结语 / 72

第五章 玩耍是童年文化? / 74

一种童年的玩耍文化 / 76

童年文化的情境化 / 79

儿童的游戏 / 82

儿童和他们的同伴 / 85

儿童的童年 / 88

结语:对童年文化的启发 / 90

第六章 童工 / 92

南北之分 / 93

儿童工作与儿童劳动 / 97

隐性工作和人口变迁 / 104

劳动的意义 / 107

结语 / 110

第七章 一个童年还是多个童年? / 112

社会结构中的童年 / 114

作为一种多元化的结构现象的童年 / 115

作为一种单一的结构现象的童年 / 120

本土的儿童 / 122

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儿童 / 125

多样性和童年的社会建构 / 126

结语: 全球性、本土性及其联系 / 128

第八章 身体与童年 / 132

基础主义者和反基础主义者对身体的论述 / 133

不可侵犯的身体: 儿童虐待 / 137

童年的经验性身体 / 139

还原论及其避免 / 142

童年及其具体化 / 143

身体性别的生产 / 147

结语: 转化身体 / 149

第九章 研究童年 / 152

童年研究的方法 / 154

年龄的成长: 年龄和社会发展性儿童 / 155

年龄问题化 / 156

社会结构中的童年 / 159

(socially constructed child), 部落儿童(tribal child), 少数群体儿童(minority group child), 以及社会结构化的儿童(social structural child)。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殊的旨趣、传统和意识形态, 它们是当代儿童研究的不同方法的表现。

但是, 这四种童年模式也预示了四种二元对立的理论主题, 这四种理论主题引发了整本书的叙述, 并且我们在叙述中也不断地回到这些理论中去: 行动—结构(agency-structure); 普遍性—特殊性(universalism-particularism); 地方性—全球性(local-global); 以及连续性—变化性(continuity-change)。由于这些理论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性紧张, 因此这些二元对立证明了童年研究的不同社会学模式之间既存在着潜在的一致, 又存在分歧的可能。所以, 每种方法和每个二元对立的理论主题都阐明了各章的经验主旨和实际兴趣。各章都将阐释和证明新童年社会学研究对社会学理论作出贡献的方式。

但是, 我们在开始时必须谨慎。童年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当然, 历史学家菲立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 1962)首先提出了他那激动人心的观点, 他认为童年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 并开创了儿童形象考古学。森内特(Sennett)认为, 这一观点开创了“将家庭作为历史形式来研究而不是作为历史中固定的生物形式来研究”(1993, 第 92 页)。之后我们还会提到, 是阿里耶斯在 18 世纪中期记录了欧洲的童年的发生。他告诉我们, 当时特定阶层的成年人开始坚定地认为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孩子不同。在成年人和儿童之间, 一种基于年龄的等级和逐渐的二元对立变得制度化, 他们各自的特点总体而言是对立的。

阿里耶斯的方法明显的优点在于将童年这一概念相对化, 从而使它能将儿童置于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 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自然生物进行分析。另一方面, 阿查德(Archard, 1993, 第 20 页)注意到, 历史感的缺乏是存在于“现时主义”中, 也就是说, 它把儿童锁在现代性的范围之中。

通过童年这一概念, 阿里耶斯获得了一种特有的关于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的现代意识。这种意识表现为对待他们的方法有不同的道德标准, 这就把儿童和成年人分为两个世界。从阿里耶斯的角度出发, 之

它们设置减少风险的策略。例如,他们限制儿童的活动,因为儿童被认为易受到身体伤害,比如交通事故或普遍认为的“陌生人危险”是袭击或诱拐的重要来源(Valentine, forthcoming)。另一方面,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都被闭路电视监控着,以控制无人看管的儿童和青少年可能带来的危险。即便是家庭的边界也有被录像、因特网等狡猾的技术穿破的危险,这些技术对儿童的童年带来严重的道德威胁。露丝(Rose, 1989, 第 121 页)注意到在机构(agencies)和意识形态中对儿童所有权的宣告的急剧增加:

童年是个体存在中受到集中管理最多的部分。儿童的健康、福利和养育,通过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不同途径在观念和行为上与民族的命运及国家的责任相关联。现代儿童已经成为无数项目的重点,这些项目声称要保护他们避开身体、性和道德危险,要确保“它”的正常发展,要积极促进特定能力如智力、可教育性和情绪稳定性的发展。

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它认为日益增加的儿童自制性和日益增加的约束这两个趋势并不像它们最初看起来那样矛盾。并且,它突显了儿童目前在后现代性政治策略中的重要程度,但是这些策略是通过抓住内在而非限制外在来达到管理个体的目的。这样一来,它阐释了权力——知识(Foucault, 1977)的新形式的微妙,在这其中,儿童被要求诉说、令自己被看见、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样也被要求受其他人的控制。露丝的观点解释了这一系列处于争执中的关于儿童的声音、利益和话语。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在弗洛伊德(Freud)遗产所提供的通向内部的旅程中,现代童年还未成为唯一。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思想中,仍存在着一个启蒙时代儿童(enlightenment child),它不仅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也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医学、社会工作、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通信系统、犯罪学、文化研究、女性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学术未来市场的焦点。

考虑到现代童年所包含的复杂性,不难假定,关于童年的传统智慧存在于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 1865 年所称为的“方便的词(the convenient jingle of words)”即先天(nature)和后天(nurture)之中。但是,我们对儿童的想象并不总是从同一个起点出发,也并非总抱有着同样的目

意义上来说,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始于一个早期建立起来的社会概念,然后再将必要的社会规则灌输给潜在的社会参与者。在社会性发展儿童模型中,这种灌输的过程就叫作社会化。社会化影响的方向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塑造个体。

这并不是说社会学家忽略了人类的生物属性。确实,社会性发展儿童模式和自然发展模式在随着年龄增长方面的特点是相似的。但是,为显示它要在社会背景中来解释儿童发展的决心,社会学反对用自然习性或天性这样的术语。社会性发展儿童模式与儿童天生是什么样子无关,也和社会自然产生地对儿童的要求无关。^①

社会化常常被社会学家用来描述儿童(有时候是成人)学习遵守社会规则的过程(见 Elkin and Handel, 1972; Denzin, 1977; Goslin, 1969; Danziger, 1971; Morrison and McIntyre, 1971; G. White, 1977)。在这方面,社会学对社会秩序及其再生产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化的有效性,以保证社会长期维持。本质上,这涉及文化从一代成功地传给下一代。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的两个定义。第一个是来自里奇(Ritchie)和科拉尔(Kollar)(1964,第117页),他们的定义恪守社会化理论传统:

理解童年的社会学方法的核心概念就是社会化。社会化的过程和文化适应类似,因为它包括儿童获得人类群体的文化,并在其中实现自我认同。儿童并不被看作是做好充分准备参与复杂成人社会的个体,而是被看作有着慢慢接近人类的可能性。

斯佩尔(Speier, 1970, 第208页)从一个更为批判性的现象学角度指出:

社会学将儿童的社会生活作为家庭和学校制度分析中的一个基本领域。例如,儿童研究的经典问题就是文化吸收(cultural induction)。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可能也是这样)通常将童年作为建立儿童行为准备机制的人生阶段,儿童从而逐渐能够参与文化伙伴的日常

① 从基础主义的角度而言,这两种模式最主要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

是将所有现象都理解为社会现象的涂尔干式的努力。已经发生的,以及最终导致这种儿童观产生的是一种向现代社会的重新民主化和分解所有剩余的隐秘的社会分层的系统转向。尽管经典社会学主要关注通过阶层形成的社会分层,但现代社会学已经开始关注所有一直以来被当作“自然的”或“仅仅是人性”的领域。因此,种族、性别、性、年龄、身体和心理能力都进入检视范围,都能从它们的社会背景来获取意义和常规实践。童年进入到这种研究潮流和获得关注的时间已经相对较晚,但终究它还是得到了注意。主观社会立场认识论在与其他童年研究方法的研究经验发现相联系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解释力。

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看似致力于儿童的兴趣和目的:是一种为了儿童的社会学(a sociology for children)而不是儿童社会学(a sociology of children)! 在很多方面,儿童被看作与成人一样,或者被看作和所有人一样:他们被看作能动的主体。另一方面,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任何一种社会群体成为自为(for-itself)群体而不是自在(in-itself)群体时,都必须接受一种政治化的否认内部差异的统一性。从而,这些同一的儿童成为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需求必须得到倾听,而这个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差异则很少被注意。这与已经被发现的问题相似,例如,将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应用到工人阶级黑人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去。强调儿童是少数群体的方法重蹈了这些问题的覆辙。

社会结构化的儿童

社会结构化方法包括了共识(sound sense),如果不是实用主义的话,这些共识开端是承认儿童是所有社会都存在的共同特征。作为所有社会的组成部分,儿童是典型的、有形的、持续的和正常的。实际上,他们具有社会事实的一切特征:他们的表现可能在不同社会中有所不同,但在每个特定的社会中他们是统一的。从角度而言,他们组成了所有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这个方法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儿童不是病态的或不完全的,他们组成了一组社会行动者的群体,且他们作为公民有需求也享有权利。在社会发展性儿童模式中,我们看见一个由理性的成人和等待接受社会要求的社会化过程的儿童所组成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化方法中承认

儿童的持续存在,也承认儿童的本性。从这一点出发,社会结构化理论进而可以考察在特定社会中或所有社会中适用于童年的必要性和充分条件。儿童再次成为一个同一的类别,存在于特定社会结构所提供的约束中。

这样一来,儿童成为一群主体,但他们的主体性既不是任性的也不是多变的。其主体性由社会所决定,因此童年也就成为一个社会现象:

我们讨论童年有一个更为积极更为重要的原因,即“童年”意味着生活在一个特定区域的儿童——无论是从时间、空间、经济的或其他相关标准来划分的区域——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换言之,“童年”使我们不但可以总结童年的特点,也可以总结童年所处社会的特点,因为他们是互相依赖不可或缺的建构;并且,它让我们可以将童年与同一国家中的其他群体如青少年、成人和老人作比较,因为他们在原则上都受到相同特点和社会构成因素的影响,尽管受到影响的方式不一样;“童年”让我们同样可以讨论在何种程度上特定区域的儿童在历史进程中被改变,因为——一般而言——它在一个国家中的持续性要比在其他形式的组织中更占主导地位;最后,当使用童年概念时,我们可以作跨国的和跨文化的童年比较,因为我们使用了同样类型的影响因素——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环境的因素。(Qvortrup, 1994, 第5—6页)

这种研究证明了儿童拥有和成人一样的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格,但他们作为研究对象的能力有所不同,这些能力都是社会结构中可以识别的特征。这一观点是双重性的,但也不互相矛盾。尽管弗朗士(Frones, 1994, 第148页)指出,“社会结构化”儿童有多重维度,且可以独立地研究这些维度,但要理解他最终所建构的“儿童”,需要和整个社会结构中综合的相互关联的制度安排的限制建立联系:

童年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个人生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个人被看作儿童,以及这个阶段的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特征……大多数童年研究都关注四个主要方面:代际关系,儿童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年龄群

最后一个实质性的任务是探讨与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产生相伴的方法论问题。本书以童年的理论建构结尾,四种解释性方法和四个二元主题都被归入了理想类型。这可用于我们在回顾时显示我们的分析是如何得到的。但是,它也揭示了其他人如何参与童年的理论建构。因此,本书的目的是对童年方法进行综合,并证明新的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以及对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传统的成员身份进行再认和庆祝。

第二编

定 位 童 年

身体的讨论(“身体与童年”一章),我们会询问,是否童年的心灵空间现在也已经变得顺从(in subjection)了,因而使儿童的主体性也受到限制。

这种双重意图在普仁德加斯特(Prendergast)关于精神、身体和社会空间对童年的控制的分析中就已经能看出端倪。她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上论证说,青少年女孩对于月经的意识和适应不仅是一个与她们经验有关的情景化问题——例如,在学校,月经的到来会成为一个让人尴尬蒙羞的事件,因为会涉及卫生保护,或是被获准不去游泳。更关键的是,这是一个形式上的因果关系(formal causality)。学校这一空间实际上塑造了身体经验和有关性与性别的认同(见“身体与童年”一章)。所以,普仁德加德特(Prendergast,1995,第360页)的研究

展示了一个学校、教育、社会 and 物质的空间如何塑造年轻女性在这一时期的自我意识和身体经验的具体的例子。学习发生在许多层面,特别是在无意识地学到正统的、看似自然的、内化了性别的层面,其核心就是那些被认为是恰当的女性特质的东西。同时,这个“天生的女性”身体的观念,和学校中致力于塑造它的过程,反映出一个西方社会中关于赋予成人女性现实价值的关键矛盾。

因此,在我们讨论与童年相关的问题时,社会空间从来都不仅是个中立的位置概念;前社会学讨论“儿童”时所说的来去自如的花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成人的幻想而已。这种浪漫的华兹华斯式的对“一片已逝去的国度,一个我们过去的生活和过去的文化”(Pattison, 1978, 第58页)的想象,在新童年社会学研究方法中没有位置。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把童年解释为一种与现代的、复杂的全球劳动力分工相联系的社会空间,正如梅西(Massey, 1984)所说,资本家生产的过程在空间体验中变得非常明显。将童年放置在这个背景中具有某种意图。结果是,儿童对这种意图的空间体验形成了未来的公民。正如厄里(Urry, 1995, 第13页)所建议的:

空间性……的涵义是多方面的,除了有区域的涵义外,还包括距离、运动、联系、特征、感知、象征和意义:用现实主义者的术语来说,空

因此,在英国,流浪儿童的位置或“住处”不是通过一个一致的社会政策和实践获得的,而是通过康宁汉姆(Cunningham, 1991)所说的,随着我们的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叠的话语”来获得的。首先,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有试图要把流浪儿童带回一种有秩序的确实可靠的生活中的非正式的(通常是宗教的)努力。免费学校(Ragged School)可以被看作这一运动的一部分,后来的洛德·沙夫茨伯里(Lord Shaftesbury)和托马斯·巴纳德(Thomas Barnardo)的慈善举措也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第二,通过强有力的刑事立法和相对严厉的量刑政策体现出的抑制儿童犯罪的尝试更为一致和官方:这一时期被送进监狱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数量明显比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多。

在英国,现代晚期私有化的儿童,主要是城市儿童,仍然是公共空间的受害者,但他们现在与空间的关系明显不同了。对于很多儿童特别是那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来说,广阔的“外界”被看作一个危险的地方,他们只能在陪护下逐渐涉足这个危险。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断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集体象征主义(collective symbolism)不断弱化所造成的。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陌生人,交往的形式是一种招待而不是欢迎。儿童在街头就是“不安全”的,其具体表现就是那些对强奸犯、性变态者、杀人犯的夸张描述和对交易的世俗的描述。希尔曼(Hillman)、亚当斯(Adams)和怀特勒格(Whiteleg, 1990)所记载的儿童从街头的消失,就是对儿童和空间不断进行概念重建的一个例子。正如希布利(Sibley, 1995, 第136页)所指出的,现在儿童

更可能在成人的陪同下在一辆汽车中来体验一个地方,而不是单独或在其他儿童的陪伴之下。汽车的功能就是一个密封保护舱,儿童透过它来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是通过与他人的接触直接体验世界。

但是同时,对于年轻人来说城市的街头仍然保持着吸引力,他们看不到它的黑暗面:

“城市街道”处于城市系统的中心,有许多消费和娱乐的可能性:

的关系构造而成的。与学校的经验相似,家的空间也是设有界限和限制的,希布利在讨论中发展了伯恩斯坦所提出的地位式家庭和个人式家庭的区别。地位式家庭的父母

对于家庭中的空间和时间的态度固执,对空间界限感到不安。如果父母总是不让儿童进入那些被认定为是成人空间的房间,总是对儿童的活动进行时间控制,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地位式家庭。保持控制意味着维持明显的、清楚的界限……例如,只有父亲可以坐某张椅子,吃饭时位置的安排是固定的……在个人式家庭中,所有这些地位式家庭的区分特点都消失了。理论上,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是平等分配的,意味着家庭中空间和时间的使用是可以协商的……玩具散落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不会成为一个问题。(Sibley, 1995, 第 131 页)

一些儿童在街头和在家都缺乏自主性可能会导致当代童年成为问题(Solberg, 1990)。正如希布利(1995, 第 135 页)所说,“即使在对家和家庭关系最善意的描述中,仍然有矛盾的世界观的暗示,其表现为对不整洁问题和睡觉时间的争执”。

除了对于养育儿童这一父母提供的、产生一种既定的家庭环境促进(或阻碍)儿童发展的方式的讨论之外,对于家庭空间如何针对儿童进行规范的论述相对较少。这种缺乏本身说明了家庭空间内童年的私有化,以及家对于儿童而言的隔离作用。家通常成为解释儿童犯罪的原因,却很少成为解释儿童成功的原因,家和学校、街头一样,提供了一种因果联系。这就加强了之前提出的建议,即对童年社会空间的解释必须超越单一的情境化解释,迈向对于其形成实质的系统探索。在哈尔登(Hallden)关于瑞典男孩和女孩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家庭生活的不同观点的讨论中(1992a; 1992b),可以大致了解这种解释如何通过考虑儿童的主体性而获得。在女孩们讲述的故事中,家庭空间的常规排列是女儿和母亲处于家庭的核心,而在男孩们的讲述中则只有一个男性处于中心,并且和家庭生活保持距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儿童获取性别角色知识的空间化。

如果家是像麦克罗碧(McRobbie)和嘉柏(Garber, 1976)很早时对于

谢里丹(1980,第152页)指出,这样一种控制形式,“不是成功的、过度的、全能的,而是适度的、可疑的、精于算计的。它通过分等级的观察、正常化的评价以及它们在考试中的结合而运转”。边沁提出,完美的监狱应该有一个中央塔,从塔上看下去,能在最大程度上看到囚犯却看不到监狱看守。福柯将这种监狱称为——“全景敞视监狱”——这种权力模式捕捉到了在一个空间形式上甚至是具体建筑中的现代性控制模式的本质。现代权力是精细化的、看不见的、粘连但又流动的。它也是快速的、精确的和深思熟虑的。全景敞视监狱的囚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处于监视之下;他们可能一直被监视着也可能没有。现实是他们在监视自己。这样,我们就从一个集体空间转移到了个人空间,公共的外在的耻辱经历转化成为私人的内心的罪恶体验。因此,现代性的儿童,在学校、在街头,甚至在家中,成了监管他们自己的警察。

实际上,儿童成了被控制的对象。在英国,从9点作为看电视时间的分水岭和某些种类的节目在儿童上床睡觉之后才播放,到实施更为严格的进入电影院的年龄限制中,儿童明白了哪里是“自己的地方”。在我们所讨论的所有领域中,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师——不断的评估,以及教育心理学和心理测验——学校辅导员、教育福利官员、父母与教师协会、社工和卫生访视员都支持这种自省(introspection)。所有这些都巧妙地以为儿童着想的名义联合起来,成为19世纪最终规训儿童空间的轨迹的终点。与简克斯(1982a)的建基于成人理论家的社会秩序视角之上的童年社会理论相似,斯蒂德曼(Steedman)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她认为童年空间的解释大部分直接与成人自身未被注意或未被考察过的概念相关。在对19世纪流浪儿童的讨论中,斯蒂德曼(1995,第114页)将他们的生存状态放置在一个意向性解释(intentional interpretive)框架中。她指出:

在某种程度上,梅休(和其他评论者)所观察和报告的儿童是通过情节剧传统来看待的,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城市情节剧赋予儿童的意义中来看待的,其做法是强调与儿童相关联的成人受到的折磨的体现。要考察情节剧,代表工人阶级家庭儿童的方法,他们的历史和涉及他们的立法的历史,我们也需要考察街头和舞台的关系,因为这